

國民教育必須順勢而行

□梁立人



議論風生

反對派反對國民教育，可說是無風起浪。為什麼呢？因為國民教育是幾乎所有國家必備的，就像飯前要洗手已成慣例。反對派反對國民教育，等於說飯前洗手會傷害皮膚一樣荒謬透頂。其實，國民教育對學生並沒有害處，只是會讓反對派感到害怕，因為，如果香港的年輕一代接受了國民教育，有了愛國思想，對國家認同更深，反對派就吹不響他們的法螺，漢奸洋奴賣西方狗仔膏藥就沒有市場。更重要的是，國民教育可以改變目前香港畸形的政治生態，反中亂港力量將失去生長的土壤。可以說，國民教育是維護「一國兩制」最好的方法，是香港穩定繁榮的基礎。所以，國民教育「要不要搞」根本不是問題，問題是搞得太遲，關鍵是「如何搞」，由什麼人來決定國民教育

的內容。

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的構想，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是一個極為大膽的想法，目的是要讓在殖民者統治下的香港，能無痛過渡回歸祖國，故一國在前，兩制在後，主次分明，不可逾越。回歸前，香港人在國家經濟最困難的時候節衣縮食，周濟自己的親人，甚至冒着港英政府的打壓，支持自己的國家。回歸後，在反對派的唆擺和操弄之下，一些香港人敵視自己的祖國，對十三億同胞白眼相對，甚至掉進反對派「民主拒共」的圈套，其赤裸裸的「港獨」心態不加掩飾。今日香港泛政治化的現象越演越烈，正是回歸以後忽視了國民教育所造成的後果。亡羊補牢，猶未為晚，若政府在國民教育這議題上不再站穩立場，後果不堪設想。

「自行決定」說有所偏頗

由於香港實行民主政制，建制派和反對派都同樣重視選票，雙方都認為，只要選票在手，就能主

宰大局。反對派更操控國民教育的議題，將國民教育妖魔化，於是，是否支持國民教育，便成了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分水嶺。建制派中一些立場不穩定者，竟隨着反對派的節拍起舞，為爭取眼前利益，反對國民教育，令反對派顛倒黑白，習非成是的陰謀得逞。

更令人遺憾的是，政府在國民教育的問題上顯得搖擺不定，表示不會強推國民教育，教材可由學校自行決定。他們以為通過這種表態，可以平息國民教育的風波。其實，這種犧牲原則的緩兵之計，不但不能緩和形勢，只會賠了夫人又折兵。因為若不能守住國民教育這一關，整個政治對弈的主動權便會為反對派所得，若愛國有罪，支持執政黨更是罪無可恕，那麼建制派進退兩難，最後必然兵敗如山倒，不用等到全面普選，香港的治權便會落在反對派的手中。

雖然，香港的政治生態對建制派不利，但今日選舉的遊戲規則對作為莊家的建制派仍有一定的優勢，只要建制派能善用自己手上的一副好牌，最後仍然能取得勝利，若因對方撒豆成兵的掩眼法亂

要由愛國愛港者編寫

我們不能不正視今日香港的政治現狀，在文教言論的陣地上，反對派是佔了上風的，香港不但有近半的學校在反對派掌控的辦學團體手上，加上教協、民主黨、支聯會「三位一體」，如果國民教育「教材自決」，那國民教育只會變成造反教育、叛民教育，更可怕的是，反中亂港勢力會乘機拿着雞毛當令箭，順勢將其反共主張塞進教材裡面，甚至連法輪功對國家的惡毒攻擊，國際反華勢力的顏色革命，都有可能成為教材的內容，到時推動國民教育豈不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嗎？

我們必須堅持。國民教育並非港民教育，必須以「一國」為先，任何不利於香港繁榮穩定，任何威脅到國家安全及影響民族團結的內容都必須清除。教育年輕一代熱愛祖國是理所當然的，因此國民教育的內容只能由真正的愛國者去制定，其他人不可隨便插手，那些不懷好意的陰謀家更要滾得遠遠的，這是「一國兩制」的原則，是不能和政治利益作交換，是不能因任何人的威脅而改變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半島動向

8月2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平壤會見正在朝鮮訪問的中國中聯部長王家瑞一行，並設宴款待。金正恩強調，將繼承金正日的遺志，使中朝友好關係世代相傳。金正恩就任半年多來，單獨會見和宴請外國客人還是第一次。外界關於金正恩近期訪華的猜測由此或會增多。

其父亦以中國為首訪地

回顧歷史，中朝關係非同一般。早年金日成曾參加中國東北抗聯，共同反對日本侵略。建國後，兩國領導人往來更趨頻繁。中國老一代領導人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均訪問過朝鮮。金日成作為朝鮮最高領導人，正式和非正式訪問中國次數更多，據不完全统计超過四十次，世所罕見。就我親身經歷而言，1970年以後，金日成曾連續幾年，每年都非正式訪問中國，有時一年還來過兩次。來訪主要是會見毛主席和周總理，商談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1975年4月，金日成正式訪華，最後一次會見了毛主席、周總理，與鄧小平舉行了會談，還在鄧小平陪同下訪問了南京市。1982年9月，金日成再次正式訪華，結束在北京的會談、會見後，在鄧小平和胡耀邦分別陪同下，訪問了四川省和成都市。1991年10月金日成最後一次訪華，在北京與江澤民舉行了會談，後又在江澤民陪同下訪問了江蘇省和揚州市。金日成生前也曾幾次出訪蘇聯和東歐國家，但次數與訪華無法相比，特別是晚年只來中國，沒有再遠行。

金正日最早非正式訪問也是中國，那是1983年，當時金日成在世，金正日還不是最高領導人，但在1980年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六大上已公開確立了接班人地位。當時金正日剛滿四十歲，往返北京均為秘密，甚至事後也沒有正式發消息。1994年金日成逝世，金正日接管主政，但朝鮮處於舉國治喪期，中朝領導人暫時沒有來往。進入21世紀，金正日作為朝鮮最高領導人開始訪華，至2011年12月去世，先後訪華七次，即2000年、2001年、2004年、2006年、2010年兩次和2012年，均為非正式，即訪問期間活動不公開，訪問之後發表綜合消息。在這幾次訪華期間，金正日先後與江澤民和胡錦濤舉行了會談，訪問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吉林、瀋陽、哈爾濱等城市。金正日生前還曾訪問過俄羅斯，但沒有訪問過其他國家。

晤中國客開啓外交之門

金正恩2010年9月被確定為接班人，他陪同他的父親金正日曾經會見過中國客人，但這次單獨會見並宴請中國代表團，是他的第一次外交亮相。據報道，金正恩在會見中還談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朝鮮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是朝鮮勞動黨的根本目標。這涉及朝鮮今後向何處去，引人關注。

鑒於歷史上朝鮮最高領導人與中國的關係，這次金正恩又破例會見了中國代表團。據此推測，金正恩近期訪華的可能性大增，當然外交上的事情有時難於預測，我們只能拭目以待。

作者為前資深外交官

陳家洛「資歷造假」須道歉

□谷 風

公民黨前主席、立法會港島區候選人陳家洛明明只是副教授，怎能自稱為「教授」？如此行為，已有違反學術規範、「誇大」自己的職稱與資歷之嫌。而這種做法，恰恰是學術機構最為反感、學者最為忌憚、公眾最為痛恨的「造假」行為。在全世界，無論是美英歐澳、日韓菲泰，這種行為無異於學術不端，會遭到嚴厲譴責。

指點香江

作為一名學者，必須要有嚴謹的學術態度；作為一名從政者，更要有基本的誠實品格。公民黨前主席、立法會港島區候選人陳家洛，身兼政客與學者兩種身份，卻深陷「造假」漩渦。公眾質疑，明明只是「副教授」的職稱，卻要宣揚自己是「教授」，這是否一種嚴肅的學術態度？這與「學歷造假」、「論文造假」又有何本質區別？陳家洛為了一次選舉而不惜「誇大」自己的職稱、賠上自己的學術聲譽，如此做法無法不讓人嘆息。

陳家洛在香港算得上是一位政治「名人」，去年公民黨選主席，他以四十一歲之齡當選，為香港所有政黨主席中最年輕的一位，風頭一時無兩。與此同時，他還是香港浸會大學的一位副教授，從事教學與學術研究工作。試問，身兼政客與學者雙重身份的陳家洛，會不知道何謂基本的道德底線？

海報網頁頻用「誇大」職稱

此次立法會選舉，陳家洛變陣空降香港島，與現任議員陳淑莊合組名單，並排在名單頭位。但多日前有網友揭發，在一份競選宣傳單張中，陳家洛的名字後面有「大學教授」四個字，並附有英文 Professor 字眼，僅在內頁介紹其詳細履歷時才用回「副教授」職稱。網友其後又發現，這類取巧的辦法在陳家洛的各種宣傳海報、橫額和網頁中頻繁使用。

翻查陳家洛所在的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其官方網頁介紹陳家洛時是寫着：Dr. Kenneth Chan Ka Lok（陳家洛博士），在其聯絡電話下則註明其為 Associate Professor（副教授），而該系的教授（Professor）英文

頭銜皆為「Prof.」，中文稱作「教授」。市民質疑陳家洛是為選舉自我抬高身價、誤導選民。亦有市民進一步發現，陳家洛向選舉事務處申報的職業也是「副教授」，與宣傳資料上使用的「教授」有明顯出入。

教授就是教授，副教授就是副教授，兩者斷無可以「互相通用」之說。陳家洛明明只是副教授，怎能自稱為「教授」？如此行為，已有違反學術規範、「誇大」自己的職稱與資歷之嫌。而這種做法，恰恰是學術機構最為反感、學者最為忌憚、公眾最為痛恨的「造假」行為。在全世界，無論是美英歐澳、日韓菲泰，這種行為無異於學術不端，會遭到嚴厲譴責。

今年7月，廈門大學醫學院教授傅瑾，被揭發其聲稱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文憑完全是虛假的。被騙的廈門大學隨即做出回應，並公布了對傅瑾的調查結果，並指「這是一起十分惡劣的主觀故意的造假行為」，校方決定解除和傅瑾的工作合同，做辭退處理，同時要求傅瑾本人通過公開渠道做出「深刻道歉」。幾乎是在同一時間，北京化工大學教授陸駿，也被揭發學歷及論文都有造假。校方調查後，也立即作出反應。

資歷造假中西方皆難容

今年的5月3日，對沖基金公司 Third Point 揭發雅虎 CEO 湯普森簡歷學歷造假：湯普森只擁有 Stonehill College 的會計學學位，而沒有官方文件中宣稱的計算機科學學位。雅虎展開調查並證實了這一說法，最終湯普森迫於壓力辭去職務。

以上例子說明了什麼？說明了學術造假是絕不容忍的行為，一經發現，必須作出嚴厲查處，中西方皆然絕無例外。在雅虎事件上，湯普森實際上並沒有「造假」，只是報錯了學位名稱而已，就要被迫辭職。在此次事件上，

陳家洛明目張膽地「誇大」自己的學術職稱，結果應當如何？

當然，或許有公民黨支持者會說，香港習慣稱「副教授」為「教授」，其他大學的衆多學者也都類同，因此陳家洛這樣自稱並無問題。持這種觀點的反對派不在少數，但必須指出的是，這是極其錯誤的「說詞」。

明顯有誤導選民之嫌

第一，其他學者並沒有「自稱」是教授，教授字眼往往是傳媒或者別人對他們的「尊稱」。在此事件上，顯然陳家洛是自己稱自己為教授。一個是被動「接受」，一個是主動「誇大」，這是本質的區別。其次，若按公民黨邏輯，教授就等同副教授的話，那麼社會將無原則可言。屆時普通記者也可以聲稱是高級記者，公司副經理也可以宣稱自己是總經理，副校長當然也可以是校長了。顯而易見，這是極其荒謬的邏輯。最後，陳家洛此次是在立法會選舉中的舉動，涉及一個嚴肅的選舉公平原則。他以一個「誇大」的職稱去拉票，明顯有誤導選民之嫌。道理很簡單，假設只有兩名候選人在競爭，一個是教授、另一個是副教授，若其中一人誇大自己資歷，會否對選情造成影響？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事實其實很簡單，陳家洛為了立法會選舉，「誇大」了自己的學術職稱。但令人感到極其失望的是，事情被揭發至今已經多日，陳氏不僅絕口不認錯，還百般推諉，更意圖轉移視線，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拒不道歉。如此行為，無異於欺騙、造假的「下三濫」手法，令人不齒。公民黨若容忍如此品行的人，市民則無法不質疑，這種政黨還有沒有道德底線？是否還知世界有「羞恥」二字？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一國兩制」與台灣定位

□李義虎

兩岸互動

輿情調研在研究兩岸關係時是一個重要的參考指標，在充分注意台灣問題複雜性及島內民意動向的同時，也應該讓台灣方面了解大陸的真實民意，這樣才能在互動中真正加深了解、促進交往。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主持的《海峽兩岸關係輿情調研與分析》，在目前已知的大陸就兩岸關係所做的綜合性輿情調研方面尚屬第一次，是大陸關於兩岸關係理論研究的一次重要嘗試。

研究基於作者對北京地區部分高校學生進行的調查問卷和實地深度訪談，其中包括部分有台灣生活、學習經歷的學生和在北京大學就學即交流的台灣學生。調查樣本中65%認為「一國兩制」適用台灣，但需要調整，以建立適合台灣具體情況的「台灣模式」，這說明樣本都已認識到台灣和港澳兩地的區別，以及由此帶來的對統一模式的影響。如果考慮佔比27%的「已經在港澳地區實施所以適用台灣」的觀點，樣本總體認為「一國兩制」適用台灣的佔據94%的比例，持肯定態度的傾向性十分明顯。

首次兩岸綜合性輿情調研

同樣，對於香港、澳門回歸十多年的「一國兩制」實施經驗是否有助於解決台灣問題，樣本中認為「非常有幫助」和「有些幫助」總比例為95%——相對於更為複雜的台灣問題，香港和澳門回歸的經驗無疑是寶貴的。

有57%的受訪者認為，相對於「港澳模式」，「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大不同在於台灣地區相關「政權法統或稱號」的問題——台灣當局應該有一個適合兩岸現實的「名分」。

如何界定台灣的地位，事關重大——既要按照一個中國原則，防止「一中一台」、「兩個中國」的分裂圖謀，還要考慮到台灣不同於香港和澳門的歷史和現實情況，顧及台灣民衆的接受程度，「既要好看，又要好吃」；與此同時，還必須最大限度地減少國際干涉勢力的干涉藉口，這無疑是對海峽兩岸各方智慧和能力的一次考驗。

要有適合兩岸現實「名分」

而在問及台灣部門民衆對「一國兩制」有抵觸或反對的主要原因，「島內分裂勢力的妖魔化和污名化」因素佔據第一位（37%），但大陸方面的宣傳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問題（32%），比如力度不夠、方式不當，必須相應予以加強和改善。我們在堅定政策的同時，應通過更多的渠道、更為靈活的方式，多層次、多角度、多領域向台灣通報宣傳，設身處地為之着想，加深台灣民衆對「一國兩制」的認識，減少抵觸和誤解，以爭取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也從根本上瓦解島內分裂勢力操縱統獨、省籍、族群等議題的民意基礎。

在「一國兩制」政策中，大陸和台灣的確切關係應該如何定位？佔70%的樣本選擇的是「大陸中央、台灣地方」，有27%的樣本選擇的是「大陸和台灣地位平等」。而在後續的問題中，佔比30%的樣本認為「一國兩

制」中把台灣定位為「特別行政區」的做法是「大大矮化了台灣的地位」，而認為「恰如其分地反映兩岸關係的現狀」的則佔69%，實質反映的是樣本對於台灣地區在中國國家中的地位問題認識有所分歧，大致呈1：2的比例。

現實中，台灣地區的地位十分特殊，「是省非省」、「非國稱國」——

「是省非省」，即現有的台灣地區不但有台灣省（所轄台灣本島和澎湖列島），而且包括福建省部分地區（即沿海的金門、馬祖等島嶼），還有東沙和南沙的一些島嶼（如南沙太平島），在行政區劃上涉及包括直轄市在內的多個省級行政單位，實質自然應該比省大。

「非國稱國」則是指台灣地區雖然不是所謂的「主權獨立國家」，但還保留着從大陸退居台灣、殘存至今的「法統」，還堅守着之前的「中央政權」架構，實行着「五權憲法」以及一整套系統的相關規定，同時擁有自成一體、裝備相當數量先進武器的幾十萬「國軍」。在國際領域，台灣當局還有二十多個「邦交國」，仍然獲得一些國家的「外交」承認，有相應的「國際生存空間」。「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台灣仍然具備着作為「國家」的一系列政權架構，加上三萬多平方公里的陸地領土、二千三百多萬的人口，發達的經濟，其在國際社會比相當多國家行為體更具國家「模樣」。

未來兩岸統一後的台灣地區如何定位，肯定要合理地照顧這個現狀，即台灣的地位要比一般意義上的「省」權限大得多、地位高得多，但肯定不是所謂的「主權獨立國家」。相對於香港和澳門，台灣的定位無論在國際法方面還是實際操作方面均是難題。

對於「一國兩制」中所稱的「一個中國」，佔52%的樣本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反映出國家認同已經深深扎根於民衆心中。耐人尋味的是，佔據43%的是包含大陸和台灣在內的「大中國」——這是一個相當有想像力和內涵的答案。它既是地理上的，也是政治上的，還是國家認同上的，但在具體的面貌上「猶抱琵琶半遮面」，不是十分清晰，卻能得到相當多的認可。這也是兩岸均能得到相當證明反應和認可的「一個中國」——這實際是「一個中國原則」和「一個中國框架」的模糊認識、模糊表述和模糊處理，同時也是海協會和海基會當初舉行兩岸會談的基礎，也是兩岸相互交流的出發點，將來也會成為兩岸統一的歸宿。

含兩岸「大中國」或成歸宿

現有的「一國兩制」成功地解決了港澳回歸問題，但在台灣問題上卻面臨着甚大的挑戰。必須從「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理論與實踐中，根據已有的法律法規，與時俱進，研究「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得出新的適合台灣的框架模型經驗，塑造能夠適合台灣特殊性的「台灣模式」，這方面可適當考量孫中山先生的憲政思想。

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偉大的愛國者，其關於國家統一、政權架構有很多完整、系統的論述，雖然有些在大陸基於歷史和現實的因素不可行，但對兩岸的地位界定和未來統一後管理模式有良好的借鑒和參照。尤為重要的是孫中山先生關於國家體制和民族統一的相關論述和精神，從孫中山的有關論述（如「國家統一，聯省自治」、「聯邦制」、「地方自治」）入手，不但可以在國家統一模式或方案上獲得台灣各界的認可和支持，同時也是對「一國兩制」與時俱進、推陳出新、建構「台灣模式」的有益嘗試。

作者為北京大學台灣研究院院長

（本文為中國經濟出版社新書《海峽兩岸關係輿情調研與分析》之序言）